

泉州文史資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新二十輯



泉州文史资料

新二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



封面题字：梁披云
封面设计：林剑仆
主 编：傅 乌
编 辑：王明健 李少园 张家瑜
 郑炳山 黄梅雨

泉州文史资料 新二十辑

编 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 刷：泉州晚报印刷厂
批准印号：泉新出(2002)内书第9号

工本费：10.00元



政协泉州市第九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组 成 人 员

主 任：傅 乌

副主任：丁毓玲 王连茂 李少园 林英明
陈鹏鹏 陈健鹰

顾 问：朱展华 庄炳章 庄清桂 吴幼雄
吴捷秋 张家瑜 郑国权 郑炳山
黄夏莹 黄梅雨

委 员：万国智 王明健 杨惠平 陈仲初
陈思超 陈梅生 林敬玉 郑正裕
郑焕章 柯建瑞 柯遵昶 徐艺星
梁吉能 蔡长溪

《泉州文史资料》编辑部

主 编：傅 乌

编 辑：王明健 李少园 张家瑜 郑炳山
黄梅雨

(以上排列均按姓氏笔划为序)

目 录

初曙风云

- 忆在晋江老五区的战斗年代 温秀山 (1)
- 五十年后话土改 李自力 (4)
- 1952 年惠东社会改革运动 李 原 (13)
-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地区 (泉州市) 的侨务工作 郑炳山 (22)
- 封建势力和农民群众的一次较量——新店乡农民群众粉碎
“反农会”阴谋 丁 昭 李泰山 (42)
- 朦胧的回忆——记解放初在涵坂工作的日子 阮传琛 (46)

革命风范

- 三位地委书记请客自己掏腰包 李自力 (53)
- 革命风云映红《刺桐花》——记许东汉主编泉州地下党革命
故事集 陈松龄 (56)
- 三位泉州市长保护三处国家重点文物 李自力 (60)

文化广场

- 高甲戏《连升三级》晋京演出的前前后后
..... 王家缙 王范强 (64)
- 联合国“海上丝绸之路”泉州考察缘起 陈 鹏 (71)

解放前的泉州报界（四）——《群力报》	黄梅雨（80）
“晋江”之名由来考	郑煥章（85）
解放前后参与泉州侨乡篮球赛的回忆	庄其章 回忆 张家瑜整理（93）

人物春秋

蔡庚水的体育情结	李 原（104）
纺织品与永春人	郑德郁（113）
太平绅士黄光汉	王明健（119）
艰苦创业 业绩辉煌——记新加坡知名企业家黄加种先生	蔡成祖（138）
香港爱国女企业家刘秀丽	吴家哲（142）
旅菲泉籍邮学家——记红印花专家黄光城	万冬青（149）
许金荣生平	沈玉水（154）
庄严国土 遗爱人间——缅怀广净法师	柯建瑞（158）
坚守大北岭 热血洒中原——黄埔同学张稚生抗战牺牲英雄事迹	庄其章 （165）

历史回音

1935年泉州大洪灾回忆	阮传琛（168）
附：《泉刊泉州水灾歌》	（171）
近现代台胞在泉州的革命活动	廖洲泉（173）
中缅友好 源远流长	郑炳山 吕胜利（178）

忆在晋江老五区的战斗年代

温秀山

1997年春节后的第10天,我专程由福州来到晋江青阳,参加解放初期第五区的老同志春节团拜会,会见了48年前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几度风雨,岁月沧桑,昔日风华正茂的年青小伙子、小姑娘,如今都是年过花甲、两鬓斑白的老头子、老太婆了。大家都为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相见时仍然是满腔热情,谈笑风生,重现了几十年前的精神风貌,使人倍感亲切。在团拜会上,同志们畅谈自己离开老五区之后,数十年来的工作和生活的动人情景。虽然各人的经历不同,坎坷各异,但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忠心耿耿,一心一意地干工作,站完最后一班岗。如今大家都已离退了,晚景幸福美满。另有一些同志已经与世长辞。他们当中有的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忘我地工作,积劳成疾而病故。个别同志在对敌斗争中光荣牺牲,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此我有很深的感怀。

1949年,我随长江支队南下,历经7个月,跋涉六千里来到福建。9月初,我们在泉州与地下党会师后,即分别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我和高珍等几位同志一起来到晋江青阳,与地下党十几位同志组建了第五区公所(县人民政府派出机构),下辖旧制3个大乡共40个保。

当时对敌斗争形势是严峻的。国民党军队虽然败逃了,但仍盘

踞在沿海岛屿如金门、厦门等负隅顽抗。五区的东面是长长的海岸线，经常有敌人闯入进行武装骚扰。还有潜伏下来的散兵游勇、土匪特务，暗地里与反动封建势力勾结，伺机反扑。青阳又是国民党的“模范”乡，反动基础较强。仅在五区辖内就有3个纵队番号的“反共救国军”。因此，我们时刻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措施，依靠群众，及时消除隐患。逮捕那些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进行斗争和审判，收缴枪支弹药，把反动气焰打下去，促进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工作任务是十分繁重的。要筹措粮草供应驻军和开赴前线解放厦门、金门的过境部队。要动员担架队支援。要剿匪反霸，平息封建械斗，建立农民协会、民兵、青年团和妇女等组织，开展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等。面对这样的形势和任务，全体干部都能勇敢地挑起重担，不顾艰难险阻，积极努力地去完成光荣的任务。

区委和区公所的干部，总共只有20人左右。一般情况下，除秘书、通讯员、炊事员等少数几个人留在机关坚持工作和守卫机关外，其余干部都要下乡到农村去。全区划成五个片，每片由3~4名干部负责。在这个群体里，大多数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南下的，有地下党的，有工农干部，也有刚出校门的学生，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真诚相处，团结合作，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按照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共同努力去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那时工作环境是很艰苦的，但同志们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对待它。分配到哪里去，叫干什么工作从不计较。出远门也要步行，有时要背上被子和挎包。白天干工作或者参加生产，晚上还要召开各种会议。照明用不是蜡烛就是油灯。长时间没有节假日，难得回家一趟与亲人团聚。生活方面的艰苦更不必说了。同志们就这样以对革命的忠诚，努力去完成一个接一个

的任务,在对敌斗争的环境中从无“怕”字,在困难面前从无退却,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巩固新生政权而作出贡献。

几十年过去了,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在改革开放大好形势鼓舞下,青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是宽阔平坦的街道,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它已成为晋江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所在地,成为一个新型的现代化城市。这些成就,是晋江市、青阳镇党委和政府,认真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结果,相信今后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五十年后话土改

李自力

晋江地区的土地改革从1950年秋开始,至1952年先后结束。光阴荏苒,五十年过去了。当年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有的已经作古,那些风华正茂的年青土改队员现在也已须发斑白。我作为当年参加过土改前的农村调查、减租、土改试点、土检的一员,记忆中还留下那翻天覆地岁月的一些片断。

调查去,新区农村是个啥样子

从北方来的干部在老解放区有丰富的土改经验,但新区的农村社会是个啥样子,并不了解,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农村调查去。

我第一次参加的是晋江县三区的津头埔调查。那是解放后第一个秋收季节,农民一早就下田割稻子去了。沿着郊区大路,可以看到从厦门战场上转来的一队队国民党俘虏兵,由几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押着走,说明地委是在战火刚熄灭时就进行农村调查的。

1950年春节刚过,我们一行十几人到晋江五区涵坂乡进行减租,工作队由地委委员张作人、专区农会副主任朱汉膺、妇联主任宋梅影带领,减租也是为土改作准备的。涵坂乡有个大地主,在泉州市开了一家大药行,而在他家农村占有土地100亩左右,全部出租给当地农民。因此,地委选择在这个乡进行减租,并从中作农村社会调查。

南下干部进入泉州前，行军中的地委就在莆田县，留下曹利正等几名干部在清江乡进行减租。地委政策研究室建立时，他已带着清江乡减租总结来报到了。

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6月30日公布《土地改革法》，此前，中央要求广东、福建两省多选一个侨乡进行调查。莆田也是个侨区，其特点和闽南有哪些不同，地委决定在莆田调查。我们政研室，曹利正、乔忠林、潘聪谋和我四人，到了莆田主要侨区涵江区的石西乡进行调查。我们四人两个是北方人、两个是闽南人，都不懂得莆田话。后来一位当地的印尼老归侨，他懂得闽南话，请他当翻译，这难题才算解决了。

我们几次调查，都是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下进行的，要挨家挨户，从在国内外人口、土地、职业、生活主要来源，收支状况等一一进行访问，然后根据这些材料进行分析。工作虽很费力，但材料是第一手的。

地委在很短时间内，从几个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掌握了新区农村的情况，同时也了解农村同城镇工商业的关系，农民同华侨、侨眷的关系，农村的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等问题，此外，还有沿海渔盐民等许多与老解放区不同的特殊问题。这些都是指导土改运动必不可少的依据。

我家在侨区，领导要就我所知的写一份侨区的情况，这个材料虽然很粗糙，但对一个初来乍到的领导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从“谁说江南无封建”说开去

正当土改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之时，一天，我从报上看到一篇题为《谁说江南无封建》的文章，批判那种认为南方无封建的观点。实际情况怎样呢？

一、就全国而言，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农村

土地的70—80%，而南方土地占有较分散，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在50—60%左右。我区地少人多，比例还要更小些。但地主仍然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我区10个县、市（除现泉州市所属范围外，尚有莆田、仙游、同安），人口387万多人，其中农村人口358万多人，人均土地不到1.5亩，其中地主每户平均占有土地23亩，人均3.22亩，而贫农、雇农平均每户仅有4亩，人均只有0.9亩多，地主占有土地超过贫雇农的好几倍。说明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存在的，地主占有较多较好的生产资料，过着不劳而获和剥削农民的生活。一些地主还在政治上操纵封建势力，称霸一方，依靠国民党反动政权鱼肉百姓、残酷压迫群众，一身二任，既是地主，又是恶霸。

二、工商业比较发达。工商业者（不包括小商贩）1.48万户，在各阶层中占17.4%。一部分地主在城镇兼营工商业，或者工商业者在农村购买大量土地、雇工耕种或租给农民，从中进行剥削，成为地主兼工商业家或工商业家兼地主。

三、少数华侨在家乡购买大量土地，雇工耕种或出租，根据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构成地主成分，称为“华侨地主”。

四、许多农村设有公田，其收入用于祭祀祖宗。据我们在莆田石西乡调查，公田之外还设有学田，用于奖励升入大中专学校的学生。据说全国解放前大学生最多的有两个县，即广东的梅县和福建的莆田，这和学田的设置有一定关系。公田、学田大部为农村封建势力操纵。

全省土改结束后，省政府从数字上发现我区地主较之其他地区少，要我们去汇报。地委要我同原莆田县委书记魏荫南去参加。我们如实反映：地委在执行土改政策是比较认真的，经过土检，反复查漏、查错。地主较少，与地少人多，土地占有分散，工商业比较发达，华侨多等特点有关。

是发动群众还是“和平土改”

土改的基本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阶级界限分明。土改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志是看群众是否发动起来了，地主、恶霸是否斗倒了，贫雇农是否起来当家作主了。

要做到这点，不是容易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长期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恶霸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那时美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朝鲜，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不时派遣小股武装在沿海登陆。地主、恶霸对此抱有幻想。我曾在惠安城关参加一次斗争恶霸的大会，数百名群众，声势浩大。那个恶霸站在台上，就是不低头认罪，斗争会开得不那么成功。第二天，《泉州电讯》刊载了一篇报道，说已斗倒恶霸了，过几天，该报又登了一篇文章，批评前天的报道失实，说这个恶霸气焰仍很嚣张，根本没有斗倒。另一方面，是长期处于受压迫、被剥削的农民一下子没有那种觉悟和勇气，甚至有的人还拉不开情面。我们在涵坂减租时，有的雇农白天从地主家挑回谷子，晚上又背着工作队偷偷地把谷子挑去给地主。

怎么办呢？靠教育、靠发动，开展诉苦，算剥削帐，有首叫“不忘阶级苦，永记血泪仇”的歌，群众唱得动情时，声泪俱下，点燃了仇恨的火焰；再是同地主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地主在大量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三是成立人民法庭，对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进行宣判，把土改、剿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结合起来。对于地主也分别对待，那些守法的，民愤不大的，从宽处理。

农民有了人民政府的支持，在斗争中也看到自己的力量，敢于起来斗争。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和乡村政权。千百年来受压迫、剥削的农民真正扬眉吐气，当家作主人了。

土改一开始，个别乡曾发现“和平土改”，即是说那里的群众没

有发动起来同地主恶霸开展斗争，而只是根据土改法等有关规定，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不到一个月就宣布完成土改了。结果地主恶霸、封建势力仍然存在，贫雇农不敢起来当家作主。土改队一走，地主又活跃起来了，进行反攻倒算，这是个教训。地委一经发现，通报全区，纠正“和平土改”的错误，这个乡的土改不得不“吃回头草”，再来一次重新土改。

思想领域里的反封建

反封建斗争，在消灭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同时，还必须摧毁代表封建统治的政权，也必然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一场反封建的斗争。

农村的封建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它是封建的经济基础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其表现是多方面的：封建械斗在某些乡村封建势力的操纵下连年不断，甚至以同宗同姓联乡进行，互相残杀，纵火毁屋、拦路抓人、杀伤人命，给群众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封建买卖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一切，从一而终，坑害许多青年男女，酿成一些家庭不幸，甚至发生集体自杀；封建迷信，迎神赛会，风靡一时，神棍、巫婆乘机兴风作浪，进行诈骗，有的地方还出现反动会道门组织。与之并存的聚众赌博、卖淫嫖娼、吸毒贩毒，污染社会风气，给社会治安带来严重问题。

对这些封建社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没有土地改革这样一场骤风暴雨式的运动来冲击是难以解决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当时被称为“三大运动”，规模之浩大，所向披靡，给封建势力以致命打击。

国民党被打败了，反革命镇压下去了，地主阶级消灭了，农民分得了胜利的果实，成为土地的主人。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人

民政府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党一号召，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在这种形势下，上述种种封建文化在短短数月之内被基本消灭。土改之后，许多地方出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是那个时代的人亲身的经历，一点也没有夸张。

取代封建文化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随着土改的进程，农村出现了学文化的热潮。每个乡村都有民校、夜校、识字班，参加学习的达 35.8 万人，为扫盲打下了基础。一向念不起书的贫苦农民子弟终于有了上学的机会。小学生从土改前的 5 万余人增至 28 万多人，中学生也从 2.39 万人增至 3.2 万多人。农村出现许多新的文化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比如文艺宣传队、腰鼓队、漫画组、宣传网、文化室、幻灯、黑板报等，标志着农村新文化的兴起，推动了社会和各项工作的发展。

地主、富农可以改变成分

土改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即是说消灭了地主阶级，将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消灭地主阶级并不是消灭地主的肉体，新区的土改较之战争年代的老区土改，因形势不同，更注重在政策上的区别对待。例如对出身于地主家庭未满 18 岁的和青年学生则不划本人的阶级成分，只划家庭出身；对于守法的地主只依法没收其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及多余的粮食、房屋，对不法地主的破坏才进行斗争和由人民法庭审判；对地主经营的工商业予以保护；分配土地时照样分给地主一份土地和留给生产资料，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地主自完成土改之日起的五年内，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参加劳动生产，没有任何破坏行为的，就可以改变为劳动者的成分，富农分子符合这个条件的三年即改变成分。

阶级成分对每个人都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影响到下一代,因为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被“打上阶级烙印”。党的政策历来是既讲成分,又不唯成分论。中央有位领导同志曾风趣地说: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如果说有错,即是送子娘娘给他投错了胎。

然而,在执行政策时往往会走样,违背党的政策,影响一些人的升学、就业和使用。地主、富农没有按政策改变成分,“文革”期间,地富反坏右列为“黑五类”,归入牛鬼蛇神。延续多年的“左”的错误,终于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党的政策时,正式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现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分。这对于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翻身农民的喜悦

土改给农民带来了胜利的果实,全区190万的贫雇农和其他各阶层的劳动人民分得3113亩土地以及房屋、耕牛、农具、粮食等。贫雇农土改后比土改前的土地占有量明显增加,雇农从0.2亩增至1.14亩,贫农从0.53亩至1.13亩,中农也从1.19亩增至1.39亩。

1951年,第一批土改乡迎来了第一个春耕生产,农民以空前的热情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解放了,生产发展了,生活改善了。尽管这一年的夏季遭受3次台风,2次洪水,但却是个空前大丰收年。晋江贞茂村是个仅有18户的小村,土改前三餐顾不上两餐,土改后的第一年,粮食除3户尚有欠缺、5户可以自给外,其余都有剩余。全区群众的购买力一般提高30%以上。德化县贸易公司1952年上半年的营业额超过1951年下半年的2倍。

农民在土改后焕发出高度的爱国热情，他们把好的谷子交了公粮，征兵时有的乡提要出两个排，有的乡提出可以出一个连。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争先报名的情景确实动人。

1951年，国民党乘美帝发动的侵朝战争要“反攻大陆”，全区尤其是沿海备战十分紧张，地委加紧土改的步伐，地委机关曾一度转移到浮桥镇的王宫。陈毅同志来前线检查战备时，在地委机关住了一个晚上。广大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沿海几起敌人小股登陆，在解放军和民兵的配合下，很快被全歼了，显示了军民合作的威力。

这年春节，地委机关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年。正月初一、初二，附近翻身后的农民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组成拜年队，一队队走进机关，锣鼓声、鞭炮声和腰鼓队、拍胸舞、踩高跷，化装表演，十分精彩，给机关增添了几分民间文艺色彩。有的乡村的农民还给机关送来了年货、甜粿、芋圆、菜粿、米糕，表示他们对共产党的一片心意，乐得几个炊事员笑呵呵，也让机关干部分享一份喜悦。

土改队留下的作风

前些年，常听见农村中对干部下乡同群众实行“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被农民誉之为“土改队又来了”。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年的土改队阶级路线分明，住在贫雇农家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我在晋江池店乡土改时同林祖慰就住在贫农李法永家，他是一位老实忠厚、勤俭的单身农民，乡中谁好谁坏，谁压迫人，谁受人剥削最深，他都一清二楚。我们吃、睡都在一起，彼此交了心，成了朋友，他给我们提供了乡中的大量情况。

土改队对工作很负责任，一切为群众的利益着想，吃苦在前，密切联系群众。“滚一身油污，沾一身泥巴”，是那个时代形容干部